

香港教育大學

The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

中國語文教育榮譽學士課程(五年全日制)

科目: CHI4655 HONOURS PROJECT II

本科論文研究

題目:從《九歌‧國殤》看楚人的尚

武精神,兼對比楚秦的勇武風氣

學生: 盧 歡

導師:郭思豪博士

日期:2018年5月18日

引言:

原始「九歌」「是先秦楚地的民間祭歌,後來經屈原」採編入《九歌》。其中,〈國殤〉是《九歌》第十篇祭詞,祭祀為國捐軀的勇士,把他們視作神靈,當中也涉及描寫悲壯的戰爭場面及歌頌戰士們果敢犧牲的精神。但歷代學者研究《九歌》,多是根據楚地的「信巫鬼,重淫祀」的文化,來研究其中的神祗及楚地的尚巫文化,而〈國殤〉當中寫實的戰爭場面及反映的戰爭精神,明顯與《九歌》其他篇章中馳騁想象、纏綿悱惻的神巫戀愛故事不一樣,故本文嘗試文史結合,從《九歌・國殤》另看楚地的尚武精神。另外,《九歌》同時也是屈原編撰的代表作之一,可以反映其君國之志,而屈原又是楚國士族大夫的代表,探討他們的愛國精神,甚至也可以反映整個楚地上下的人文精神。故本文根據〈國殤〉的文本内容,輔以當時的歷史環境,並且對比相鄰楚地的強秦,對比兩國在地理環境、治國之道乃至民族性格等方面呈現出來的尚戰、鬥士風氣,來考究楚民族特有的尚武精神。

中外對尚武精神的研究或定義不一,例如盧梭的戰爭觀於民族的尚武精神,是基於人在社會的生存意義,乃至擴展到整個宇宙的和平構想,是超越個人的英雄主義和國家;3又西方文化傾向個人主義,尚武精神也見於英國騎士精神和美國英雄角色;4《春秋左氏傳》中的尚武精神,有研究總結為以保家衛國為己任、以忠君守義為操守、以視死如歸為氣節三方面。5有見及此,參考與本課題有相近歷史背景的研究論文,結合春秋戰國時期的尚武風氣,故本研究課題總結的尚武精神,指崇尚武藝、鬥志、力量、愛國為一體的民族精神,可以指直接呈現出來的物質形式,也可以指楚國上下包括君王的尚戰精神、士大夫的君國道義、士兵的英勇氣概,更可以指體現在該地的文化風俗、歷史傳統等。故下文以文本內容為基礎,先後從物質表現形式、無形的精神面貌及對比秦楚兩地的尚武文化,探討

⁵ 李弋菲(2015):《中西方英雄主義的對比分析》,河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,中國知網 2016 年 06 期。



^{1 《}九歌》原本為流傳民間的祭禮歌曲,朱熹指出,楚國沅、湘之地的風俗信鬼巫而好祀,祭祀時男女巫師都會歌舞娛神,甚至求至神靈附體。而《漢書·郊祀志》記載,楚懷王重鬼神祭禮,希望獲得神靈庇佑以擊退秦師。所以《楚辭·九歌》乃屈原在朝為官時承懷王之命,將原本為民間祭歌的《九歌》改為朝廷祭辭。因此,《九歌》不僅帶有人神戀愛的浪漫色彩,同時也寄託了屈原的忠君愛國的情懷。詳見饒宗頤主編(2013):《楚辭》,香港,中華書局,頁73。後文《楚辭》的引文皆此出處。

² 屈原(公元前 340-277),出身貴族,楚國的愛國大臣,曾掌巫史之職,主要活動時期為楚懷王(前 328-前 299 在位)執政時期,早年深受懷王信任,官至左徒。他輔助懷王改革內政、主張聯齊抗秦,但後期受到佞臣讒言,先後被兩次放逐到南楚地——漢水、凌陽一帶。他主要作品《離騷》、《九歌》等大多是其放逐期間所作,以此彰顯君國之志。

³ 陳晴(2017):《盧梭的戰爭觀與尚武精神》,上海外國語大學博士學位論文,中國知網 2018 年 01 期。

⁴ 黃婷婷(2015):《尚武精神影響下的春秋武士書寫》,青海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,中國知網 2016 年 06 期。

一、有形的物質形式

1. 〈國殤〉中的兵器武裝

當時,吳、越、和楚國鑄造的兵器以刃部鋒利、工藝精良、裝飾華麗著稱。 "在〈國殤〉中出現的兵器,均可以體現楚國在戰爭方面的準備是十分充裕的。例如「操吳戈兮被犀甲,車錯轂兮短兵接」中的「戈」可以是長兵或短兵,相傳是 吳國所產的戈最為鋒利,故吳戈是當時比較先進的武器,而此句更暗示強大的楚國 已經滅掉吳國,現在已經掌握吳國鑄造兵器的技術。「犀甲」乃犀牛皮甲,皮甲是 春秋戰國時期流行的主流防備工具,根據 1978 年湖北隨州市擂鼓墩墓群一號戰 國墓實物復原,皮甲分為甲身、甲袖和甲裙三部分,共計 164 片。甲片由絲帶編 綴,甲片有弧度,並有明顯模具壓過的痕跡,說明當時已經出現了類似今天流水 線的作業。⁷下圖乃前文提及戰國楚地出土的皮甲復原圖,也有理由推證本文的 士兵衣著乃是如此:



戰國皮甲胄(復原模型) 戰國曾侯乙墓

(圖1)8

另外,《荀子·議兵》說楚:「楚人鮫革犀兕以為甲,鞈堅如金石;宛鉅鐵矛,慘如蜂蠆,輕利僄遫,卒如飄風」,[°]顯示楚國人用鯊魚皮、犀兕皮作鎧甲,剛硬得如同金石;宛地出產的鐵矛,狠毒得好像蜂蝎的毒刺,士兵行動輕速敏捷,如旋風一般。可見,楚國兵器的鑄造水平較為先進,器利兵壯的軍事武裝十分齊備。

^{9 〔}戰國〕荀況(2011):《荀子》,北京,中華書局,頁 242。



⁶ 劉煒(2001):《春秋戰國——爭霸圖強的時代》,香港,商務印書館,頁 20。

⁷ 陳大威編繪(2012):《戰略戰術兵器事典 11·中國歷代甲冑》,台北,楓樹林出版事業有限公司,頁 29。

⁸ 國家文物局(2002)《中國文物地圖集・湖北分冊(下)》,西安,西安地圖出版社,頁 575。同見陸錫興主編(2004):《中國古代器物大詞典・兵器刑具》,石家莊,河北教育出版社,圖例,頁 10。

2. 十族大夫佩劍的傳統形象

「劍」在〈國殤〉內文的意義為作戰兵器之一:「帶長劍兮挾秦弓」與「操 吳戈兮被犀甲」,兩句為互文對照形式,預示戰爭正處於膠著狀態,也跟前文一 樣對應,是描述士兵的作戰情景。楊泓提出西周初年,劍的形制較短;短劍也稱為 「上」,用於遙擊,即擲劍。10 根據劉秀峰的研究,西周晚期,劍制逐漸加長, 達到 40-60 厘米。東周吳、越兩國的質量較好,例如越王勾踐劍、吳王夫差劍, 而標準的長劍更可能自東吳興起。11而越國滅吳,又被楚國所滅,所以吳越兩國 精湛的鑄劍技術,為楚國所掌握;南方地理水網密佈,山地較多,不適合全面依 靠戰車作戰,主要以步兵陣型為主,故劍此類兵器可以大派用場。

劍除了作為戰場上常見的兵器之一,長劍也是楚國士大夫的傳統形象,顯示 地位等級和象徵高貴品德,例如「琴心劍膽」代表文武雙全。屈原作為楚國貴族 的形象代表,也是有佩劍的習慣。在屈原其他作品中,出現不少佩劍的情景,例 如

〈東皇太一〉: 撫長劍兮玉珥, 璆鏘鳴兮琳琅。

〈少司命〉: 竦長劍兮擁幼艾,蓀獨宜兮為民正。

《離騷》: 帶長鋏之陸離, 冠切雲之崔巍。

但貴族的劍與十兵的劍有分別。例如貴族的劍多為鑲嵌金、玉等,可以讓劍更加 閃亮,光耀奪目,上述引文中的「玉珥」、「璆」是隨佩劍附帶的裝飾品,「琳琅」 「陸離」等字詞描述長劍的光澤及與佩玉互相輝映,也從中反映楚國士大夫內外 兼修的品性,「成於中而形於外」的表現形式,更是儒家傳統士族的追求。

再者,根據中國劍專家皇浦江總結,春秋時期開始,鐵器廣泛使用,在湖南 等地的楚墓,鐵劍的數量較多,長度超過一般的青銅劍,一般不短於 70 厘米, 接近或超過一米。其硬度大大提高,超於質地較脆的青銅劍,但因為鐵器的冶煉 水平參差,產量小,含碳量低導致質地未夠剛硬,並未完全取代青銅兵器。12到 了戰國時期,楚國的煉劍技術進步迅速,改善鐵劍的硬度,如《史記·范雎蔡澤 列傳》記秦昭王語:「吾聞楚之鐡劍利而倡優拙,夫鐡劍利而士勇,倡優拙而思 遠慮。吾恐楚之圖秦也。」『可見,楚國的鐵劍兵器成為秦國的顧忌之一。此外, 青銅劍較為光澤,深得君主貴族的喜愛,而鐵劍作為新興的金屬工具,為十兵的 實用戰鬥工具。故《國殤》中的劍多數是鐵劍;而其他篇章中的劍(士族的劍), 很可能是青銅劍。楚國不斷改善劍的鑄造水準,精益求精,以壯大兵力,個中的 尚武追求已不言而喻。

劍是戰場必備武器,而居廟堂之上的貴族,也喜好佩劍,只是作為一種外表 裝飾,襯托個人的英勇形象,也可反映楚國內外的尚勇風氣。

¹³ 張大可(2000):《史記新注》,第三冊,北京,華文出版社,頁 1500-1501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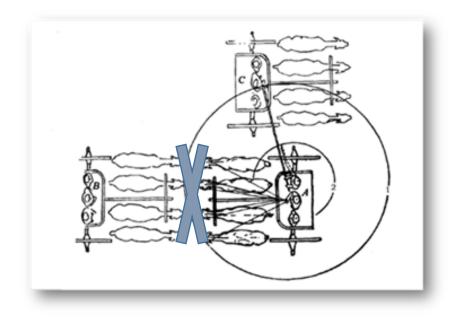
¹⁰ 楊泓 (1986):《中國古兵器論叢·劍與刀》,文物出版社,頁 45。

¹¹ 劉秀峰(2016):《刀劍與中國傳統文化》,杭州,浙江工商大學出版社,頁7。

¹² 皇浦江 (2007):《中國刀劍》,濟南,明天出版社,頁 6-9。

3. 陣法與謀略

內文「車錯轂」是當時較為流行車輪戰略,因為當時各國求變圖強,大國紛紛謀劃較為堅固強大的攻守模式,而商周車戰盛行的重信義、輕變詐的正面交戰模式被拋棄。¹⁴各國普遍採用以中軍配合左右軍的寬正面橫向陣型,以中軍為主力,兩翼配合作戰,改變了商周以來採用的方形陣、正面攻擊的呆板車站模式(如圖 2)。車軸兩端裝有矛刀,戰車進行時,矛刃可殺傷地方的馬腿和步兵腿。步兵作戰的時候經常出現短兵相接的狀態,他們所用的武器主要是長短搭配。短兵有劍、或一米多的戈、矛等,也配備盾和弓箭;長兵有兩米多的戈、矛、殳、戟等。從下圖所見,「車錯轂」是雙方的車輪交錯,暗指軍隊已經開始進入敵軍中心的陣列。步兵持的短兵武器,也正與敵軍交錯互插。圖中圓圈的部分正是「車錯轂」的情景,而另一部分顯示正面交戰的作戰方式已經被摒棄:



(圖2) 15

當時楚國已經建立健全的兵車作戰制度,明代董說在《七國考》卷十一《兵制》 說:「《春秋感精符》云:『齊晉並爭,吳楚更謀,不守諸侯之節,競行天子之事, 作衝車,厲武將,輪有刃有劍,以相振懼。』」,「「衝車」乃戰車,高誘註:「衝車,大鐵著其轅端,馬被甲,車被兵,所以衝於敵城也。」「所以此類的衝車,輪 子的軸端裝上長刃劍,證明「車錯轂」的膠著狀態,衝車的殺敵功能不可窺小。

接著,雙方已經到達混戰的局面,出現「凌余陣兮躐余行,左驂殪兮右刃傷」的局面。「左驂」是指一車四匹馬,中間兩匹稱服,外邊的兩匹稱驂,跟前文提到的左右軍作戰的方式是配合的,左右軍每人手持兵器,與敵方交戰;而中軍則

[『]楊義(1998):《楊義文存》,第七卷,<楚辭詩學>,北京,人民出版社,頁254。



¹⁴ 劉煒&何洪(2001):《春秋戰國——爭霸圖強的時代》,香港,商務印書館,頁38。

¹⁵ 楊泓(2007):《中國古代兵器與美術考古論集》,北京,文物出版社,頁58。

¹⁶ 〔明〕董說:《七國考》,守山閣叢書版本,載於《四庫全書・史部・政書類》,檢自 https://ctext.org/library.pl?if=gb&file=86893&page=3 , 瀏覽日期:2018 年 3 月 15 日。

負責控制四匹馬。故戰鬥隊形是由四匹馬拉的一輛馬車為基本單位,稱為一乘。 每乘配備的兵力從西周的是三十人,增加到七十五人,唯有楚國是一百人。其中 三人為甲士,在車上;餘下為步卒,在戰車周圍形成三個方陣,構成一個基本戰 鬥隊形,如下圖:



(圖3)18

所以,「凌余陣」、「躐余行」、「左驂殪」及「右刃傷」都顯示,上述的軍隊形勢 即將瓦解,進入敵我膠著的狀態,無論是步卒還是騎士,都傷亡慘重,暗示敵贏 我輸的結局。

綜上所述,在〈國殤〉開首,是一幕寫實情景,直接描繪的是戰爭場面,此處的正面描寫似乎與《九歌》其他章節開首截然不同。例如〈雲中君〉:「浴蘭湯兮沐芳,華採衣兮若英」;〈少司命〉:「秋蘭兮麋蕪,羅生兮堂下」。這些描寫大都瀰漫著浪漫色調,與〈國殤〉的殘酷現實明顯不是同一風格。開首一句乃奠定整篇的感情基調,故可以看到其他章節的感情風格乃是婉約纏綿的,歌頌神祗的美好容貌,表達巫靈對神靈的似有若無的愛慕;而〈國殤〉的正面寫實,實寫兵器裝備與戰爭場面營造悲壯慘烈的氣氛,當中呈現的兵器和陣法戰略,體現楚國在武裝戰爭方面的改革和追求,這也是當時楚國得以稱雄南方的原因。

二、無形的尚武精神

1. 為國事犧牲

這首詩描寫多種互相碰撞的堅利武器、敵我交織的陣列、玉槌擊鼓的聲勢,烘托着戰爭的慘烈氣氛,也預示此次乃背水一戰、敵強我弱的抗戰。關於本篇具體的祭祀對象,一般都認為是全體戰士,而清代蔣驥說:「〈國殤〉所祭,蓋指上將言,觀援枹擊鼓之語,之非泛言兵死者矣。」,而也有學者同意此說法,認為「霾兩輪兮蘩四馬,援玉枹兮擊鳴鼓」此句顯然是歌頌一位主將在危急關頭,仍然指揮若定、頑強奮戰的英雄形象。¹⁹以主將為中心,描述了整個戰爭場面,當中也包括了廣大戰士,在主將的帶領下,不懼犧牲、奮勇抗敵的情景,後來便泛指歌頌全體將士。例如前文提到「士爭先」是寫士兵們在戰爭開始後,勇往直前;後文:

天時 對 兮威靈怒,嚴殺盡兮棄原 壄。 出不入兮往不反,平原忽兮路超遠。

¹⁹ 金開誠等 (1996): 《屈原集校注》, 北京, 中華書局, 頁 282。



¹⁸ 劉煒&何洪(2001):《春秋戰國——爭霸圖強的時代》,商務印書館(香港)有限公司,頁39。

帶長劍兮挾秦弓,首身離兮心不懲。 誠既勇兮又以武,終剛強兮不可凌。

暗示戰爭快要結束,士兵被「嚴殺盡」、屍體被「棄原壄」,慘烈的戰況叫上天也 憤怒,令天威顯靈。眼見敵勝我敗的結局,可是士兵仍然義無反顧,仍然手持長 劍,掠奪敵方的武器,縱使身首離異,為國而戰的信念仍然不會動搖。楊義先生 對此有進一步的總結就是:

本詩的主題,在於把尚武精神作為一種民族意志進行深度的開發。其開發的深度不僅見於臨陣時的奮勇爭先,而且見於身處逆境之時那種不知退縮的困獸猶鬥的氣概。²⁰

也就是說戰爭的英勇姿態不是乘勝猛追,而是明知戰敗仍誓不低頭、頑強負戰時體現的堅不可摧的專一情感和不可侮辱的尊嚴。此外,根據楊義的說法,可以總結出殉國精神:尚武精神與民族意志又是相互相承的。因為「誠既勇兮又以武,終剛強兮不可凌」中的「誠、勇、武、剛、強」可視為尚武精神的「五德」,這五個維度只是多角度的虛指,是多種維度的精神和現實的結合,例如「誠」指對國家民族的忠誠、「勇」指個人的性格、「武」指練就的武藝或作戰技巧、「剛」指不屈的精神意志、「強」為作戰的力量。這「五德」是尚武精神的全方位詮釋,體現了當時楚國士兵的勇武意志和行為。

2. 君王的戰爭榮耀

楚國上升時期,一些有作為的君王都以以身許國為榮。《春秋左氏傳・莊公四年》記載楚武王熊徹(前764-前690),暮年攻伐隨地,臨行告恙,但其夫人鄧曼激勵他說:「王薨於行,國之福也。」於是武王「王遂行,卒於樠木之下。」 ²¹ 《春秋左氏傳・哀公六年》記載楚昭王熊珍(前523-前489)死於讎:

秋,七月。楚子在城父,將救陳。卜戰不吉,卜 退不吉。王曰,然則死也!再敗楚師,不如死; 棄盟逃讎,亦不如死。死一也,其死讎乎!²²

楚昭王認為楚國軍隊再失敗,不如一死;逃避戰難,也不如一死;反正死都是一樣,不如戰死報答國恨家仇,來得更有意義。可見上述兩位君主,都視在戰場上 犧牲為榮,頗有一國之君的雄將之風,與中原之地重視文禮的君主頗為不同,甚 至有蠻橫民族的特點。

《國殤》的寫作目的或起源歷代主要的說法,一是《漢書·郊祀志》谷永的說話:「楚懷王隆祭祀,事鬼神,欲以獲福助,卻秦軍」²³;二是哀悼丹陽、藍田

²³ 吳廣平註釋:《楚辭圖文本》,長沙,岳麓書社,頁73。



²⁰ 楊義(1998):《楊義文存》,第七卷,<楚辭詩學>,北京,人民出版社,頁 254。

²¹ 〔晉〕杜預集解(1981):《春秋經傳集解·莊公》,第一冊,珍仿宋版印,台北,中華書局,頁 3。

²² 〔晉〕杜預集解(1981):《春秋經傳集解·哀公》,第三冊,珍仿宋版印,台北,中華書局,頁 14。

之戰中死亡的士兵,祈求在日後的戰爭中能打敗秦國。²⁴二者說法基本都是以祈福為目的,希望戰事順利,以卻敵軍。民祭《九歌》的內容經過屈原採集及編改,呈現在後世的內容已經上升至國祭的級別,同樣,〈國殤〉的內容為君王所需所喜,有見及此,此篇祭辭所歌頌的勇武精神,也正是國君之意。

最上位者的示範,是尚武的精神結合民族意志,正正彰顯本文對尚武精神的 定義,是集鬥志、愛國、武藝為一體的綜合價值觀,是民族精神的體現。所以國 君寧死不辱國威的道德意志和行為規範,均會從上而下,從內而外影響整個民族 的尚武文化的形成。

3. 屈原的君國之志

屈原遭受小人讒言及懷才不遇,一生被放逐兩次,但身在異地,心系國君。 他的作品反映出來的思想不難發現其愛國情懷。雖然地處南偏的楚國遠離儒家學 說的中心地帶——齊魯之地,但是屈原很大程度上是儒家思想的體現者。例如《楚 辭》中的《漁父》創作時間及原作者已經不可考,或是楚國民間紀念屈原的故事 作品,但當中體現的屈原精神,是頗為準確的。

屈原曰:「舉世皆濁我獨清,眾人皆醉我獨醒,是以見放!」

漁父曰:「聖人不凝滯於物,而能與世推移。世人皆濁,何不淈其泥而颺其波?眾人皆醉,何不餔其糟而歠其釃?何故深思高擧,自令放爲?」

屈原曰:「吾聞之,新沐者必彈冠,新浴者必振衣;安能以身之察察,受物之汶汶者乎!寧赴湘流,葬於江魚之腹中。安能以皓皓之白,而蒙世俗之塵埃乎!」

漁父「不凝滯於物,而能與世推移」的說法頗接近道家順應天命、保全自身的主張,而屈原恰好相反,他認為「舉世皆濁我獨清,眾人皆醉我獨醒」、「安能以皓皓之白,而蒙世俗之塵埃乎」,是不能夠與世濁同污,自身潔白更不能夠容忍時間的塵埃。所以,屈原以死殉國,以示其志。

雖然屈原出身貴族之列,身居廟堂,掌故巫史文職,未必能領兵打仗,但志向與視死如歸的將士是一致的,也嚮往死得其所,因此歌頌國殤為鬼雄,才有《九歌》最終一曲——《禮魂》,「春蘭兮秋菊,長無絕兮終古」彰顯的是生命輪迴,祭祀往返,眾神靈包括殉國的鬼雄,乃是無絕終古的存在,這便是死有所值的意義。而〈國殤〉的改編不像祝詞,風格與其他章節比較也頗為不同,更可看出是屈原的用心改編之作。他專門描寫楚國強盛時期足以傲視中原的戰車作戰方式,同時也讚揚全體將士一往無前的戰爭精神,所以看到屈原是在留戀昔日的沙場雄風,歌頌歷史精神,惋惜楚懷王掌政下,國家一再受秦國欺凌的情況,更希望以此喚醒日漸沉淪的楚國上下,重振昔日南國雄風。

由此推論、屈原改編〈國殤〉乃是詠古諷今。他是儒家精神的體現,讀書出仕,立志報國,濟世為懷,雖然不能執掌兵器,殺戮沙場,但希望以歷史精神喚起民族的鬥志,毋忘楚地一脈相承的尚武風氣。後來,屈原的愛國之志及其民族

²⁴ 饒宗頤主編 (2013): 《楚辭》,香港,中華書局,頁 73。



-

4. 楚人祭祀國殤的傳統

本文表面是描寫慘烈的戰爭場面,作為士兵,殺敵為本任,自然不難體現他們的誠、勇、武、剛、強的一面。但何以見到整個楚國上下都存在着尚武精神?可以從楚人的風俗文化考究。楚國地處長江以南、漢水流域,有沅、湘、澧、洞庭等水域,有巫山、九嶷山等山嶺,也含括苗族、土家族、瑤族等南方民族的先祖,例如濮、越、巴、蠻等土著民族。²⁵ 楚地跟中原各國不同,是邊鄙之地的子男之邦,當時西周分封,按公侯伯子男的序列分封建國,可見楚王的地位之低。雖然是鄙夷之地,勝在地大物博,便培養了楚人長期的歷史開拓精神。如《左傳》官公十二年記載:

楚自克庸以來,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於民生之不易、禍至之無日、 戒懼之不可怠;在軍,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於勝之不可保、紂之百克而卒 無後,訓之以若敖、蚡冒篳路藍縷以啟山林。²⁶

可以看到楚國不能跟中原諸侯國那樣,依靠先輩的功勞和血統,坐享遠祖的遺澤,而是靠每一代楚國人開山闢地、不許懈怠的民族精神。而且遠離當時繁榮的王畿,亦受封建禮制影響不大,所以楚人可以在荊棘之地練就一種鬥士型、進取型的冒險精神,可以開創自己的文化、文字、禮儀、祭祀等等。正如《漢書·地理志》云楚人:「信巫鬼,重淫祀」",而《九歌》正正就是祭神的祝詞,楚乃多神之地,山川河流、日月風雲都可以為神,例如東君、雲中君、湘君、湘夫人、山鬼、河伯等等。此類馳騁想像、敢於創新的祭神文化,也是楚地人民形成進取、果敢的民族性格的重要體現。

前文提到的山川河嶽神靈,在中國各地的祭祀文化是常見的,但楚地也把為國捐軀的士兵當成鬼雄,也視為神靈的一員,從而便有了祭祀國殤的傳統。綜合歷代學者的看法,「國殤」泛指為國戰死的將士。洪興祖在《楚辭補注》曰:「謂死於國事者。《小爾雅》曰:無主之鬼謂之殤。」朱熹、王夫之、蔣震都依從「死於國事」此説法;而不同的是,「殤」的定義略有不同。清代戴震在《屈原賦注》指出:

殤之義二。男女未冠笄而死者,謂之殤;在外而死者,謂之殤。殤之言傷也。國殤,死國事,則所以別於二者之殤也,歌此以弔之。²⁸

而《說文解字》對「殤」的註解為「不成人也」(人年十九至十六死爲長殤,十五至十二死爲中殤,十一至八歲死爲下殤。从歺,傷省聲),按《釋名·釋喪制》:「未二十而死曰殤,殤,傷也,可哀傷也。」²⁹可見國殤乃有「國傷」之意。根

^{29 〔}東漢〕許慎:《說文解字》,台北,九州出版社,2006 年版,頁 337。



²⁵ 過常寶(1997):《楚辭與原始宗教》,北京,東方出版社,頁 12-18。

^{26 [}春秋] 左丘明 (1958):《春秋左傳》,香港,中華書局,頁 560。

²⁷ 〔東漢〕班固 (1975): 《漢書・地理志》, 北京, 中華書局, 頁 2380。

²⁸ 饒宗頤引戴震之說,詳見饒宗頤主編(2013):《楚辭》,香港,中華書局,頁73。

據吳廣平註釋版本,祭祀「國殤」,古代又叫「裼祭」。《禮記·郊特牲》:「裼,強鬼也。」繼而吳引申《世本》:「微作殤」,注云:「微者,殷王八世孫也,裼,強死鬼也。」³⁰所以,「殤」,或作「裼」,「裼」又等同「微」,也就是指強鬼、鬼雄,所以「國殤」二字體現的更是為國戰死的鬼雄,具有剛強英雄形象。且不論為國事而死者是否已經成人,但可以肯定的是〈國殤〉是歌頌為國家戰死沙場的將士,乃為國家的傷痛之情,理應受到國民的尊重和紀念。所以,從國家到民間的祭祀,也就出現了祭國殤的文化傳承。

另外,〈國殤〉中的鬼雄是多神,跟東君——太陽神、雲中君——雲神、大小司命——壽命子嗣神,等眾神靈均有自己的主司職責和神主地位不一樣,鬼雄原本乃是無主無所的孤魂夜鬼,屍首分離在路途遙遠的原野戰場,但在國民的祭祀傳統裡,他們死後可以升等為神靈,受到後世子民的尊仰。他們「出不入兮往不反」這種視死如歸的精神可以在祭祀的文化裡代代相傳,無形中也影響了楚地的民族精神。

從以上四方面——士兵的英勇形象、楚國君王的生命價值觀、士大夫的軍國精神及民間的祭祀傳統,均能體現一種全面的無形的尚武精神,而且是內外結合、上下一致的表現形式。

三、對比秦的尚武風氣

春秋戰國時期,秦楚同是邊陲之地,但經過內外圖治,雙雙成為中原國家懼怕三分的強國。秦地處西戎,強悍勇武之風乃見稱史上,而楚國也以其尚武之風,得以傲視群雄,成為秦國一統天下的大敵。都是邊陲大國,但兩者的尚武精神的體現是頗為不一樣的:

1. 地理環境: 楚優秦劣

從地理環境上來看,楚地遠比秦地富饒,物產豐富。楚國在戰國初期,是七國中地域最遼廣的,有長江及其分支流域,江湖網布,是魚米之鄉,同時山林茂盛,高樹密林,蘊藏大量生產資源。在《戰國策·宋衛》中墨子想勸說楚莊王勿攻打宋國,認為楚地有比宋國更好的物產,例如「荊之地方五千里」、「荊有云夢、犀兕麋鹿盈之,江、漢魚鱉黿鼉為天下饒」、「荊有長松、文梓、楩、楠、豫樟」,最終勸阻楚王滿足於楚地的富庶情況。³1而秦國則不太一樣,土地較為貧瘠,沒有楚國得天獨厚的優養條件,更臨近西戎邊境,練兵打仗乃效仿他們的作戰方式,更具勇猛精悍的風格。兩國邊境相接,常常發生奪地之戰,例如武關,位於今陝西省丹鳳縣東南,地勢險要,控扼關中與長江中游、江漢平原之間的通道,是秦師東伐的主要路線之一。公元前 312 年,楚軍自武關道攻秦,秦軍以退為攻,採取誘敵深入的策略,在藍田大敗楚軍。³2〈國殤〉中對於戰場地理環境的描寫:「天時懟兮威靈怒,嚴殺盡兮棄原壄」、「出不入兮往不反,平原忽兮路超遠」,

³² 錢穆校 (2011):《秦漢史 》,北京,九州出版社,頁 279。



³⁰ 過常寶(1997):《楚辭與原始宗教》,北京,東方出版社,頁 12-18。

³¹ 饒宗頤主編 (2014): 《戰國策》,北京,中信出版社,頁 429。

可見戰場已經移師楚國境外原野之地,進軍秦國的路途遙遠,與楚國深入西南對抗秦師的歷史不謀而合。且不論此場戰役由誰先發挑釁,但從歷史上來看,秦國一直對東邊各國虎視眈眈,意在稱霸中原,而楚國得志於富饒的南方水域,吞併南方小國而對中原各國敬而遠之,故也有偏安之意。由此可見,楚國的尚武氣焰較秦國為小,同時求取和解,故而在實際的軍事戰爭和策略上,未能匹敵民風強悍的秦國,最後在公元前223年被秦所滅。可見,雖然在地理環境上,楚國優勝於秦國,地域的優越感反令楚國傾向偏安政策,未能像秦國那樣遇強則剛,壯大國力,最後統一六國。

2. 改革強國: 楚弱秦強

從改革圖強的政治策略來看,春秋戰國時期,各地群雄據起,秦楚兩國雄心 壯志的君主也願意起用賢士,改革圖強。楚莊王在令尹孫叔敖的輔佐下確立楚國 霸主地位,《韓非子·難四篇》:「楚莊王舉孫叔而霸。」³³;楚悼王命吳起變法, 整頓軍武,健全法制,而且成效顯著,《史記,孫子吳起列傳》:「於是南平百越, 北並陳、蔡、卻三晉,西伐秦,諸侯患楚之強」34;楚懷王起初重用屈原,官至左 徒,針對國內弊政進行改革。另一方面,秦國則善於利用各地的卿客,例如張儀 的連橫計——「事一強以攻眾弱」35、商鞅變法等,都讓秦國能夠興內而攘外。 同是變法,力求富國強兵,但兩國的風格不一。楚國的變法大臣多為理想主義, 變法實行的強度不夠,例如孫叔敖為政務清淨,這又是道家的本色,《淮南子‧ 主述訓》記:「昔孫叔敖恬臥,而郢人無所害其鋒」,36可見,孫叔敖並非有一顆 成就大業的心,隱藏其鋒芒與才華。屈原出身貴族,根據《史記•屈原賈生列傳》 所載,他從小接受良好的正統教育,「博聞強志,明於治亂,嫻於辭令」,37是有 出仕報國的志向,但他受傳統儒家「仁義禮智」影響下的禀賦和修養,也影響了 他的變法之道,而他筆下的騷賦,更可看到他浪漫色彩的一面,更兼巫術和道學, 故變法圖強也只是停留在理想層面。而秦國則不同,商鞅是務實派,信奉的是韓 非子的軍事理論,貫徹法家精神,鼓勵農耕,論賞軍功,同時也加強中央集權, 故輔助秦國漸以強大。由此可見,即使兩國欲達霸主地位,也嘗試對於軍事武功 推行改革,力求更強大,但是楚國的尚武風氣,特別是軍事改革,始終未及秦國 來得更實在、更兇猛,甚至可以假設〈國殤〉的勇武風氣可能只是屈原與楚國上 下的憧憬而已。

3. 民族性格及文化: 楚柔秦堅

從民族性格和民族文化來說,楚國求偏安、願和解,秦國更傾向於兼併和進

³⁷ 〔西漢〕司馬遷(1982):《史記》,第八冊,北京,中華書局,頁 2481。



^{33 〔}戰國〕韓非(2015):《韓非子·難四》,上海,上海古籍出版社,頁 470。

^{5 [} 西漢] 司馬遷(1982):《史記》,第八冊,北京,中華書局,頁 2161。

³⁵ 劉煒&何洪(2001):《春秋戰國——爭霸圖強的時代》,商務印書館(香港)有限公司,頁23。

³⁶ 張正明 (1995):《楚史》,武漢,湖北教育出版社,頁 156。

攻;楚國崇尚感性與柔雅,秦國追求務實與嚴謹。

根據《史記·楚世家》記載:六年,秦遺楚王書:「楚倍秦,秦且率諸侯伐楚,爭一旦之命,楚王患之,乃謀復與秦平。」³⁸十四年,楚王與秦昭王好會於宛,結和親。³⁹而從秦地的開闢歷史看,根據《史記·秦本紀》記載,秦國先祖幫助商湯伐桀,世有功於商,商秦之間保持友好關係,因為其部落在西戎,可以保西陲。⁴⁰此後,周平王給秦「岐以西之地」,雖然秦國力不及中原列國,但不斷與西戎、夷狄抗爭,逐漸以強制強,《詩補傳》卷十一記述秦襄公是一個有作為的統治者,上台後一直在整頓武備,「備其甲兵,以討西戎」⁴¹可見,楚國雖然稱霸南方,但雄心不足,求安於地大物博的現狀,而秦國則一直與戎、狄對抗,遇強則強,強悍精剛的民風世代相傳。

楚人地處林原廣闊、湖泊密集的江南平原,即使屈原筆下的湘水、沅水兩岸 山林幽深, 猨聲啼鳴, 那也不是絕高的山峰。例如《九歌·山鬼》中描寫當地環 境——「余處幽篁兮終不見天,路險難兮獨後來」、「杳冥冥兮羌晝晦,東風飄兮 神靈雨」、「靁填填兮雨冥冥,猿啾啾兮又夜鳴」,正是這樣的地理環境,給了楚 人一種浪漫、幽怨,更富於想像的情懷。例如楚地好巫術,把天地神靈山川河泊 視為有生命的個體,自然與天地萬物都有一種神秘的感情聯繫,這與儒家提倡「民 胞物與 」的精神頗有相似。故禁地造就的文學家、思想家無不帶有這種情感,例 如心懷天下的屈原、尚靜守柔的老子、齊物逍遙的莊子⁴等等。春秋戰國時期, 各國文學、思想百家爭鳴的時候,但在秦國,法家學說逐漸被確立為治國之道, 而作為單純的文學創作活動,是嚴厲被禁止的,畢竟務實的政策遠遠比想像文學 來的更有成效。《商君書》,秦國散文的典型風格,文章開門見山,直言不諱,沒 有鋪陳、誇飾、委婉之詞,內容也直接以振興經濟、整頓吏治、強兵健將為主, 有學者這樣評價其「文風刻峭而缺乏文采,不僅比起同時代的汪洋恣肆的《莊子》 和瑰麗多彩的《老子》、《孟子》等作品差得很遠,就是比起同是法家著作的《韓 非子》也顯得槁瘠而枯燥。」43可見,秦國的文章格調是如此的實在和剛強,也 頗符合法家的思想和統治政策。相比之下,雖說楚人因為地域和歷史原因,不得 不以強大、尚戰、進取的精神生存於南國、務求強大疆域、但若果跟強秦對比、

³⁸ 〔西漢〕司馬遷 (1982):《史記》,第五冊,北京,中華書局,頁 1729。

⁴³ 林劍鳴 (1992):《秦史》,台北,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,頁 455。



³⁹ 黄國軒(2010):《春秋列國史料彙編》,香港,當代文藝出版社,頁 262。

^{40 〔}西漢〕司馬遷(1982):《史記》,第四冊,北京,中華書局,頁 894。

⁴¹ 楊之水 (2012):《詩經別裁》,北京,中華書局,頁 128。

¹² 歷史上關於莊子的國籍有多種說法,是宋國、蒙國、楚國等,筆者認為說莊子是楚國人的,是把楚國當成楚地來說,是南方諸侯國乃至後期楚國北上掠地的合拼,後來,楚國再聯合齊國等滅掉宋國,瓜分宋地。自宋代以來,朱熹等人就將莊子說成楚人:「莊子自是楚人……大抵楚地便多有此樣差異底人物學問。」所以,近代一些學者例如朱自清說莊子子宋國人,他的思想却接近楚國人;根據曹礎基的研究。莊周雖是宋人,但經常活動於宋楚之間,故本文把莊子學說也當成楚國的民族文化之一。詳細參考曹礎基注說(2008):《莊子》,開封,河南大學出版社,頁 5;高柏園(1992):《莊子內七篇思想研究》,台北,文津出版社,頁 3。

便顯得柔弱了。所以說楚人雖有尚武精神,也嚴謹專注於軍事兵器的鑄造和積極 開闢領土,但其骨子裡,以文化底蘊的角度來看,這種勇武風氣是夾帶柔情的, 頗有俠骨仁心的風采。

對比楚秦兩國地理環境、治國之道、民族性格及文化,乃發現楚國的勇武風氣,雖不及秦國來得勇猛剛強,但自有其民族本色,是在積極進取的過程多了一份浪漫和仁慈。

万、總結

綜上所述,本文以〈國殤〉的文本為基礎,並且輔以相關的文獻資料,探究楚人的尚武精神。此精神不僅表現在有形的兵器和作戰陣法上,也不只是君主和士族大夫的個人追求,這是一種大民族精神,故更滲入在楚國的文化、風俗上,逐漸形成地域性格特徵。但是,〈國殤〉後收入《楚辭》,此書歷來被學者視為一本文學巨著,就算當中描述戰爭的情景是寫實的、直接的,但也無法遮蓋其文學特有的虛構成分;何況這原是一首祭辭,更帶有幻想色彩。故本文還藉著對比秦楚兩國的勇武風氣,可以發現楚人的尚武風氣遠不及秦人來得兇猛和務實,甚至頗具有儒家的君子風範,及浪漫的英雄主義情調,所以這也印證該文的文學色彩和祭祀特色。雖說〈國殤〉的尚武精神可謂是楚國上下的嚮往和想像,但其核心精神是一脈相承的,讓楚地民眾面對強敵更是誓不低頭,抗戰到底,例如在《《史記・項羽本紀》提及楚人的堅定信念,是「楚雖三户,亡秦必楚」,而李清照也歌頌項羽為鬼雄,在《烏江》一詩寫道:「生當作人傑,死亦為鬼雄。至今思項羽,不肯過江東。」",此就是楚人的尚武和尚勇精神,雖是一種不識時務的悲壯犧牲,甚至經司馬太史公著墨渲染,難辨史實真相,但其核心還是〈國殤〉中「誠、勇、武、剛、強」五個維度的體現。

[&]quot; 孫崇恩選注(1988):《李清照詩詞選》,北京,人民文學出版社,頁 12。



參考書目

- 【1】〔東漢〕班固 :《漢書·地理志》,北京,中華書局,1975年版。
- 【2】曹礎基注說(2008):《莊子》,開封,河南大學出版社;
- 【3】陳大威編繪(2012):《戰略戰術兵器事典 11·中國歷代甲冑》,台北,楓樹 林出版事業有限公司。
- 【4】陳晴(2017):《盧梭的戰爭觀與尚武精神》,上海外國語大學博士學位論文, 中國知網 2018 年 01 期。
- 【5】[明]董說:《七國考》,守山閣叢書版本,載於《四庫全書·史部·政書類》, 檢自 https://ctext.org/library.pl?if=gb&file=86893&page=3 ,瀏覽日期:2018年3 月15日。
- 【6】〔晉〕杜預集解(1981):《春秋經傳集解·莊公》,第一冊,珍仿宋版印,台 北,中華書局。
- 【7】〔晉〕杜預集解(1981):《春秋經傳集解·哀公》,第三冊,珍仿宋版印,台北,中華書局。
- 【8】高柏園(1992):《莊子內七篇思想研究》,台北,文津出版社。
- 【9】過常寶(1997):《楚辭與原始宗教》,北京,東方出版社。
- 【10】國家文物局(2002)《中國文物地圖集·湖北分冊(下)》,西安,西安地圖 出版社。
- 【11】〔戰國〕韓非(2015):《韓非子·難四》,上海,上海古籍出版社。
- 【12】黄國軒(2010):《春秋列國史料彙編》,香港,當代文藝出版社。
- 【13】皇浦江(2007):《中國刀劍》,濟南,明天出版社。
- 【14】黄婷婷(2015):《尚武精神影響下的春秋武士書寫》,青海師範大學碩士學 位論文,中國知網 2016 年 06 期。
- 【15】金開誠等(1996):《屈原集校注》,北京,中華書局。
- 【16】林劍鳴(1992):《秦史》,台北,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。
- 【17】劉煒&何洪(2001):《春秋戰國——爭霸圖強的時代》,香港,商務印書館。
- 【18】劉秀峰(2016):《刀劍與中國傳統文化》,杭州,浙江工商大學出版社。
- 【19】陸錫興主編(2004):《中國古代器物大詞典·兵器刑具》,石家莊,河北教 育出版社。
- 【20】李弋菲(2015):《中西方英雄主義的對比分析》,河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, 中國知網 2016 年 06 期。
- 【21】錢穆校(2011):《秦漢史》,北京,九州出版社。
- 【22】饒宗頤主編(2013):《楚辭》,香港,中華書局。
- 【23】饒宗頤主編(2014):《戰國策》,北京,中信出版社。
- 【24】〔西漢〕司馬遷(1982):《史記》,第八冊,北京,中華書局。
- 【25】[西漢]司馬遷(1982):《史記》,第五冊,北京,中華書局。
- 【26】〔西漢〕司馬遷(1982):《史記》,第四冊,北京,中華書局。



- 【27】 孫崇恩選注(1988):《李清照詩詞選》,北京,人民文學出版社。
- 【28】吳廣平註釋:《楚辭圖文本》,長沙,岳麓書社。
- 【29】〔東漢〕許慎:《說文解字》,台北,九州出版社,2006年版。
- 【30】〔戰國〕荀況(2011):《荀子》,北京,中華書局。
- 【31】楊泓(2007):《中國古代兵與美術考古論集》,北京,文物出版社。
- 【32】楊泓(1986):《中國古兵器論叢・劍與刀》,文物出版社。
- 【33】楊義(1998):《楊義文存》,第七卷,<楚辭詩學>,北京,人民出版社。
- 【34】楊之水(2012):《詩經別裁》,北京,中華書局。
- 【35】張大可(2000):《史記新注》,第三冊,北京,華文出版社。
- 【36】〔春秋〕左丘明(1958):《春秋左傳》,香港,中華書局。
- 【37】張正明(1995):《楚史》,武漢,湖北教育出版社。